

王韜生活的一面——風流至性

王 爾 敏

摘 要

王韜本名利賓字子九，乳名蘭瀛。生於道光八年(1828)死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崑山考中生員，即易名王瀚字蘭卿。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傭書上海墨海書館，直至同治元年(1862)俱用此名字。惟因其上書太平軍，為官兵查獲，追緝王氏歸案，將治以通賊重罪。王氏逃死避難，遂隱遁香港，自此易名王韜，以此名終其一生。

王氏原不過一知書文士，秀才身分。流寓上海，傭書西士，收入菲薄，只為養家活口。有何機會可使之名揚天下？不枉後世一再研究探考？反覆思辨，則確信王氏在近代史中先驅地位，在若干領域，無法不一論王氏，以見世變之乘。

近世研究王韜之論文專書，不下一百七十種。最受學者重視與肯定者在於王韜先驅思想地位，此一範圍要佔學者重視之首位，研究王韜者，多以思想為主。其次要重點，則集中於王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之地位，一般俱肯定王氏在繙譯中國經典之貢獻，抑且王氏與西洋教士之交游，亦是其中重點。再次要之領域，則於王韜於同治九、十年間在香港主創《循環日報》。早在《申報》創刊之前，一般學者亦無不肯定王氏在報業界之先驅地位。最次要一個重點，在研究王韜與太平軍之關係，民國二十年代，盛行太平天國研究，有不少人研究王韜上書太平軍一案，惟此論題並無重大意義。前人研究，大抵在此四個範圍。本文另闢一新方向，並無標新立異之意，而是相信王韜生平著作，載述當日名姬，成書不下七八種之多。而日記、情詩尚未與計。豈可放過不問？抑且

所載者多為真人，少有杜撰，未可盡以小說妄誕視之。實且此俱王氏親身經歷，具備口岸市民生活考察之價值，妓女亦居市肆流品一種，願有識之學者能紆尊屈身一探究之。

王氏生平段落分明，道光二十九年以前在鄉一段，正值英年，除考中秀才外，並無若何表現。道光二十九年(1849)起，王氏受僱於上海墨海書館。由是注定其長期遠離故鄉浪跡在外之命運。正值上海對外開埠不久，王氏且居住上海城北郊外，亦正是外洋來華洋商之新闢埠區，王氏在此流寓十四年之久(1849 ~ 1862)。適正親歷上海口岸之滄桑嬗變。王氏工作職司，每日為西洋教士佐理繙譯新舊約《聖經》，亦同時繙譯讚頌聖詩。惟王氏私記，甚少言其工作性質內容。反而用心於探訪名姬，穿梭於群芳之間，詩酒徵逐，流連忘返。因而在此期間撰成《花國劇談》及《海陬冶游錄》兩書，記注當日真人真事。正以表露王氏羈滬時期生活見聞。

若以王瀚之一個窮秀才而言，天下累百萬計，江南更是人才蠅集。豈有出人頭地之日？然竟以上書太平軍領袖，而被官軍搜獲，遂遭清廷上諭明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嚴拿歸案。王韜實在難逃一死。恰巧遇到其居停主人西洋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出面庇護，交由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藏匿領事館，並協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W. A. Bruce)向總理衙門恭親王交涉，拒絕把王氏交出，一面使王氏潛搭輪船，逃亡香港。此實託命於死亡邊緣，而卻為王氏生平重大轉機。王氏易名王韜，旅港達二十三年之久(1862 ~ 1884)。其生平重要表現而為後世反覆討論者，亦俱在此一時期，真是禍兮福所依。

王韜在港依仰於西洋教士，得機而先後游訪西歐二年半，聘問東瀛五個月，因而接觸東西洋文人仕女，遂亦備記結交經過，游樂情景，乃撰著《漫游隨錄》、《扶桑游記》二書，於所見西洋東瀛仕女，一一記注其才貌身影。俱為一代實錄，參考有憑。

王氏於光緒十年(1884)重返上海定居，已年近六旬，其實已名播遐邇，不愁衣食。然仍穿梭於鶯燕之群，流連於詩酒之會。名士風流，不減疇昔。此期又著有《淞隱漫錄》、《淞濱瑣話》二書，完全以青樓女子書場女子為撰述範圍。仍以傳記性介紹為主，備載上海名姬，亦更及於外地傳聞。

王韜生活的一面——風流至性

王 爾 敏*

- 一、緒 言
- 二、落拓寒士，羈命海隅
- 三、黃畹公案，遁隱香江
- 四、東西漫遊，結緣異域
- 五、前度劉郎，重現滬濱
- 六、結 論

一、緒 言

天生王韜，使文史之士常不得清閒。自清末陳其元《庸閒齋筆記》為同時人上海之直接記載起。迄今世之研究論文專著，決不下於一百七十種。^① 多人考究王韜，保持高度關懷與興致，實自有其誘人理由，但從歷來著作中觀察，自然可以獲得幾分了解。

向時研究王韜，學者大多集中於其時代思想之分析。此是重大論題，自居首要目標。其次則就中西文化交流，以見王韜之先驅成就，此亦十分重要，自受廣泛注意。再次則專就其近代報業地位與貢獻。以中國人開辦報紙而言，與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① 林國輝、黃文江撰，〈王韜研究述評〉，《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期六（香港：1993年7月刊）。

黃勝、伍廷芳、錢徵、黃協垣、蔡爾康均足代表近代報業先河。再其次，則在考證王韜與太平天國之關係，此論題最狹而多隱晦，惟探討者亦興致有加，論點歧出。凡此四個方面，均已吸引不少學者，傾心從事，乃使論者層出不窮，意見多彩多姿。看來還會有一些開拓空間。

有關王韜研究，我個人注重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貢獻。有一些著作問世。^② 同時我的門人林國輝君也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其研究論文。近年大陸學者鍾叔河先生、李景光先生一直給我寄贈王韜資料，十分可感。凡此師友的督促，也使我無法停下來繼續思考王韜問題。令我二十年來久久不能忘懷者，是中興大學一位學農科的學生黃瑞祥君，他做學生時，一面讀書，一面研究王韜。他對王韜景慕推崇，讚美之至，具極高興趣研究王韜。終在其畢業之前發表一篇研究論文。^③ 這些親身接觸的誘力和感動，是促使我繼續關懷王韜的道德力量，終於我想要在前人已完成研究之外，希望開拓一些新領域，做一些額外補充。希望具有參考價值。

有關王韜綜合性的研究與傳記，問世甚早而且至少已有十二種之多。^④ 關於王韜身世，前人有不少考證與記載，大體一切疑問多已澄清，本文自不作任

② 王爾敏撰，〈王韜早年從教活動及其與西洋教士之交游〉，《東方文化》，卷十三期二，（香港大學，1975年刊）。又，王爾敏撰，〈王韜課士及其新思潮之啓發〉，《東方文化》，卷十四期二，（1976年刊）。

③ 黃瑞祥撰，〈王韜一生事蹟考〉，《興大青年》，卷三期十（1975年刊）。

④ 1. 吳靜山，〈王韜事蹟考略〉，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36年）。2. 呂實強，〈王韜評傳〉，《國語日報副刊》，《書和人》（台北：國語日報社，1967年7月1日）。3. 賴光臨，〈王韜的生平與著述〉，《報學》，卷四期三（1969年12月）。4. 汪榮祖，〈天南遯叟王韜〉，《新知雜誌》，第四年第一期（1974年2月）；第四年第二期。5. 黃瑞祥，〈王韜一生事蹟考〉，《興大青年》，卷三期十，1975年刊。6. 熊秉純，〈王韜志事與生平初探〉，《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十四（台北，1982年）。7. 陳祖聲，〈王韜〉，《新聞人物》一（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8. 林棟，〈王韜〉，林言椒、李喜所主編，《中國近代人物研究訊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9. Britton, Roswell S., "Wang T'ao,"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Edited by Arthur W. Hummell.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43). 10. McAleavy, Henry., *Wang T'ao: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Displaced Person*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53). 11. Lee, Chi-fang., "Wang T'ao (1828-1897): His Life, Thought, 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 Ph.D. Thesis (Univ. of Wisconsin, 1973). 12. Cohen, Paul 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4).

何考辨工夫，但凡在此寫出，要負起完全責任，為免於瑣碎，不多申述辨證過程，抑且概述王氏身世輪廓不務詳盡。

王氏本名利賓，字子九，乳名蘭瀛。^⑤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1828.11.10)生。王氏三代及家人子女，出身年貫，曾在咸豐十一年七月開給趙烈文，趙氏補記於七月十三日(1861.8.18)，可以舉證於次：

王瀚，原名利賓，字子九，一字仲衡，號蘭卿，又號嬾今，行四，道光戊子年十月初四日戌時生，新陽縣人，附生。曾祖鵬翀，祖科進，父昌桂，母朱氏，慈侍下姊一，弟利貞故，妻楊氏、林氏，女二。^⑥

在此徵引王氏身世，其重要在其被清官方緝拿之前之正確名姓。可免除無謂之爭議。

王氏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新陽縣籍在崑山考中生員。其時學政張芾(字小蒲)頗加稱賞。今人顧廷龍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已據《崑山青衿錄》所載，確證其本名利賓，乃出於崑山科考考生榜名，王氏應考正名是王利賓。自無可質疑。^⑦惟王氏自署長洲人，何以用新陽縣籍？世人未嘗有合理解釋。其實主因在於科考。蘇州府一城三縣：長洲、元和、吳縣，是人文薈萃之地，王氏避地新陽，乃因競爭者弱，容易考中之故。

王氏於登科顯名之後，隨即改名王瀚，字蘭卿，亦稱嬾今。王氏在咸豐初年所刻印章，多見其名王瀚之印，並有蘭卿之印記，亦有「戊子生」(道光八年)等印。^⑧王氏曾以蘭卿之名於咸豐四年受洗禮，成為基督徒。^⑨就多方文

⑤ 前人研究，未嘗提及王氏乳名。其實載於王著《漫遊隨錄》卷一，道光二十六年(1846)王氏赴南京參與江南鄉試之時，乘暇與友人訪秦淮畫舫妓女任素琴、繆愛香兩校書。王氏自記云：「鄰舫中有相識者笑謂余曰：阿蘭坐擁兩美，豔福真不淺哉。蓋余小字蘭瀛也。」

⑥ 趙烈文著，《能靜居日記》(台北學生書局據趙氏手稿影印。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初版)，第一冊，頁614。

⑦ 陳祚龍撰，《流學雜記》引顧廷龍〈字起潛〉致胡適信函。載《新知雜誌》第四年第四期(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刊)。

⑧ 王韜手稿日記，附《蘅華館印譜》，原件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又，王氏名號甚多，學者早有著錄。最早者見於吳靜山撰：〈王韜事蹟考略〉，載《上海研究資料》(上海，民國二十四年；台北：中國出版社影印)，頁671-691。

⑨ Paul A. Cohen (柯保安),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1974), p.20.

獻了解，大抵自王瀚易名之後，此名此字，一直應用至咸豐十一年乃至同治元年。而其再易名王韜，乃是同治元年八月以後逃亡到香港，則終其一生，俱用王韜字子潛，或紫銓之名，或亦字仲韜。雖然王氏別名雅號甚多，前人多已屢屢稱述，不再重複。惟前賢所未提及者，王韜實尚有紅豆詞人及玉璫山人兩雅號，願備錄於此。

本文雖然會涉談一些王韜相交中外友朋至好，但非所研究重心，只是順便提到。而重點自多關乎女性。是以學界同道應避免將王韜之交游看待本文。此特須聲明者。

二、落拓寒士，羈命海壖

王瀚生平相關女性，有用情最深之少年原配夫人楊夢蘅，乃同一鄉里。可惜命薄早卒，時王氏奔走衣食於上海，偕妻日度窮愁。王氏當在咸豐元、二年賦悼亡，追念前妻，有諸多淒豔詩文。可惜其華蘅館詩未多問世，或當絕跡於天壤之間，今已無法藉以憑吊。而尚只能在王氏與內兄楊引傳（字莘圃，生員）信函中透露一二。觀其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58.12.4）致楊引傳書有云：

翠釵一股，乃夢蘅奩中舊物。玉碎香消，僅僅存此。以為記憶，雖與我萬金，不易也。寄語忍之，且體此念，毋使儒林騰笑也。^⑩

王氏生平論及早歲出道，必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算起，實即開始羈命於上海口岸。原來王父昌桂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即來上海城北傭書於墨海書館。二十八年（1848）正月王瀚首次到滬探望父親。惟昌桂不久病故，王瀚因謀生無著，終亦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式到上海受僱於墨海書館，承傭於英國教士麥都思（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門下。^⑪及咸豐六年（1856）麥都思回英，王氏又先後傭僱於慕維廉（Rev. William Muirhead）及楊雅涵（Rev. Griffith John）直至同治元年（1862）閏八月王氏逃赴香港，前後在滬達十三年之久。乃王氏屢自述者。

^⑩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印），頁50。

^⑪ 王韜著，《漫遊隨錄》（光緒十三年，繪圖石印本），卷一。

王瀚初入世道，旅滬謀食，雖為英少倜儻，實則不善治生，無時不嘆窮困，往往借貨典當，艱於用度。此與其跌宕不羈之個性有關，在滬交游，幾無日不偕友買醉。此外則又偶作勾欄訪豔之行。自難免於酒色之譏。

就正常夫妻生活而言，王氏初賦悼亡之後，在咸豐二年九月，有位相識而具德望的前輩林謙晉，號益扶，將女兒冷冷遣嫁王瀚，以為繼室正妻。其實林老尚有親生女鳳齡，於同年十月十四日遣嫁滬紳顧蕙卿，係習醫文士。而冷冷只是林老之養女。王瀚頗露出親疏之怨語，亦不滿意冷冷。對於貞靜無才女子未免過分。^⑫

林謙晉，字牧疇，福建同安籍，原久居台灣，本是舉人出身，大挑任安徽建平縣令。老年流寓上海，得與王氏交游。咸豐二年遣嫁兩女，仍寓居上海城內。其以養女嫁王瀚，結為近親，對王氏已是十分眷顧，頗為器重。後日亦來往頻密，未嘗薄視王瀚。最後於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病故於上海，時已七十歲。^⑬

王氏生平少言及家人，惟知其妻冷冷，易名懷蘅，實伴隨其一生。王氏潦

- ⑫ 王韜手稿日記，《瀛壖雜記》（即蘅華館日記手稿之一），咸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記：余在茲日愈貧困，布衾莫贖，爨火將虛。待屆明年，決計歸里。第還家之後，無田可耕，忍作留侯之辟穀耳。嗟乎！天之厄余，不至於此極不止也。余所娶冷冷乃閩人女子也。是女為林君撫養，非其所生。余後日旋歸，必當別擇嘉耦，蘆簾紙閣，著箇孟光，亦屬文人佳話。（原稿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又，考察王氏《蘅華館印譜》，收有「林氏冷冷」及「冷冷私印」兩章，出於友人潘惺如在上海所刻。當可知王氏未薄待後妻。
- ⑬ 《王韜日記》，頁124，咸豐九年五月初一日（1859.6.1）云：前夜留宿在閩人公墅，籌辦益扶先岳喪事。益翁囊中並無所蓄，病時所用，乃係英譯官密安士（J. A. T. Meadows）之夫人所贈，死後不名一錢。檢其箱篋，僅有皮、棉、單、夾衣數十襲而已。乃往見南館董事章蕙閣，則言閩人公賻三十金及一柩，餘事惟君酌辦。喪具稱家之有無，勿過靡可也。是日未刻入殮。嗚呼！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沒世無稱，蓋棺論定。君子於此，有深痛焉。憶予與益翁相識已十年矣，始投縞紵，繼締絲蘿，其交亦可謂密矣。乃益翁晚與予頗疏，原其故，因城陷時寄居我家，微有芥蒂也。益翁性迂訥沈默而不免猜測，出門數十年，無首邱之思，於父女甥舅間絕不言及家事，故余亦不知其家中有何人也。及死後，啓篋得見其往來手札，始知有侄宜恕，屢勸之歸，而益翁遲回不決，尚有出山之想。古人云：「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真可嘆也」。益扶名謙晉，字牧疇，原名謙光。喜慶癸酉舉人，丙戌大挑一等，前任安徽建平縣，戊子江南鄉試外宿官。祖籍同安，現居台灣。又，同前引書，頁125，五月初六日（1859.6.6）記云：是日為益扶先岳第一七日，羽士為之誦經，循俗例也。所遺書籍，約有一櫥，為之檢點登數，以便鬻去。然所存自《十三經注疏》外，佳者寥寥。時文數十部，皆不值一錢。閩行有林西官者，將啓行至台灣，為作一書致其侄宜恕，書中略敘顛末。宜恕居台灣西城。

倒窮途，顛沛飄泊，直至終老上海，實賴林女之勤苦操持家務。尤其王氏跌宕自熹，放浪形骸，徵逐酒色，揮霍無度，全不顧妻子生活，林女亦未嘗怨尤。應是無才有德，終能相偕白首，豈非王氏之福？此女與夢蘅同為王氏生平閨中忠實伴侶。自當首先引敘。

王瀚旅滬十三年，為奉養母弟及妻女家人，負荷實重。且經常有返里之行，實應歲考之需為多，非在於探親訪友之悠閒。一面在滬傭書求活，一面時刻存回里定居之念。惟買田建屋之志，徒作空想，屢屢念言，終難實現。收入微薄是固然，而王氏任情酒色，未免用度不周，不惟毫無蓄儲，而往往借貸度日。王氏日記多言生活窮窘之狀。咸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日記云：

余逋負甚多，將近中秋，索者紛至，即欲築九成臺逃債亦不可得，真為悶絕。前日正齋（孫啓榘）贈余詩云：珍重今時留息壤，也應早蓄買山錢。蓋勸余省穡而用之，為他時退步。^⑭

王氏為生活亦常質典衣物，往往又作揮霍。咸豐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記云：

午後至長生庫中，以布衣質錢，立俟良久，足為之疲。^⑮

關於傭僱於西洋教士求活謀生者，原不止王氏一人，雖多窮困名士，其收入原足顧家用而有餘，惟王瀚寅支卯糧，逋欠最多。然雖稱貸於人，又往往只為飲酒。原來加倍工作，無非在賺錢買酒。如其咸豐二年十月初六日日記云：

杜門不出，終日鈔胥，所得青錢，藉以換酒，亦一樂也。^⑯

同年十月十六日日記云：

數日無錢，悉以敝衣典庫，重苦，誰相諒也？^⑰

直到年底，例須清還逋債，王氏乃於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還清舊債，得能平安渡歲，真是窮困堪憐。如王氏日記云：

是日，將一切逋負略為摒當。除夕，九成債臺可以毋庸逃債矣。^⑱

王瀚旅滬生活，時虞斷炊，固自是事實，卻不足顯見王氏真實情狀。王氏

^⑭ 王韜手稿，《茗蘂齋日記》，即蘅華館日記之一，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⑮ 同前引書。

^⑯ 同前引書。

^⑰ 同前引書。

^⑱ 同前引書。

在滬，交游甚廣，十三年之中，載錄其相識友朋之姓名者，不下二百人之多。雖然來往頻繁者少數，亦當在三十人以外。本文重點在以女性為主，故只能提及有關人物，而無法在此詳論其男性友朋。

王氏在滬生活中常受餽贈與金錢往來者以應龍田（字雨耕）為最，王氏受其厚賜不少。應氏浙人，在英國領事館任繙譯。其次是吳樵珊（字澹人）乃亦受僱於西洋教士者，再其次是孫啓榘（字正齋），是旅滬富戶，時時提供借貸。此外王氏亦向名宦巨室上書求財。上海富人郁泰峰，江蘇巡撫徐有壬，均曾先後贈金王氏。雖然亦均無法救王氏之長期窮困。然王氏才名遍於滬瀆，至咸豐七年以後，即稍有改善，而酒色徵逐則毫末未減。

王瀚風流雋賞，跌宕不羈，除正妻楊氏、林氏而外，早已結識崑山女子，稱為紅蕸者，未必是真名，而王氏迄今至少保有情書三封，早年寄紅蕸者，咸豐間尚有不少豔詩，亦為紅蕸而作，俱在其蘅華館手稿之中。同時每見其日記中記載收到紅蕸來書，可確信實有其人，並非虛擬。凡此皆為王氏旅滬一段早期姻緣，紅蕸願為夫子妾，而王氏則絀於錢財，乏金屋藏嬌之貲，終未成就才子佳人文壇佳話。二人情書往還，直至咸豐八年未斷。然王氏避兵赴港之後，音塵遂絕。^{①⑨}

王瀚生平狎妓之始，應在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到金陵應考江南鄉試之時，年方十九歲。在秦淮畫舫結識任素琴、繆愛香兩校書。王氏鍾情於任素琴，三十年後尚作記述。其著作中兩度念及。^{②⑩}

我可以承認王韜在近代思想史上所佔先知先驅地位，並亦熟知中國近代報學王氏亦居創始大宗首位。同時人只有黃勝可與並列。即上海《申報》在創辦之先，乃特派錢徵（昕伯）赴港向王韜請教，連《申報》亦在後輩之列，

①⑨ 王韜手稿，《蘅華館雜錄》，附鈔致紅蕸女史書，以及豔詩原稿。原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氏咸豐年間情書豔詩，俱存於此，多半幸存無損。又，《王韜日記》，頁62，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1859.1.15)日記云：辰刻，施蕙庭從生村來，袖出玉人前後二札，詞旨淒婉欲絕，讀之令人墮淚。午後，同蕙庭至順興茶室，閑話竟晷，又款之於酒樓，聊以酬青鳥之勞。蕙庭又欲代予覓小室於鹿城（崑山），意殊倦倦，甚可感也。既夕，挑燈作復書。夜漏三滴始眠。

②⑩ 淞北玉鮓生（王韜）著，《海陬冶游錄》，光緒四年戊寅夏，眉珠小龕印。王氏自序云：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尋訪青溪春藏楊柳之家，入閉枇杷之院。任姬素琴，此中翹楚。既識一面，遂訂同心，氍毹歸來，音問中絕。

王氏在報業史上尸祝地位，無可質疑。在此若論風流蘊藉，酒色名士，近代文人中自也有王韜地位。此尚不足論。所須特別申敘者，在於王氏所輯《豔史叢鈔》，再加王氏生平相關著作，使王氏也高居近代香豔情史、閨閣列女傳之開創宗師。中國近代文學史往往完全不提王韜，實是一種專業偏執，嚴重疏失。

我在此無意逾越至文學領域，不會額外討論近代文學。但只點明一個關鍵性線索，請朋友注意一下近代現代文學班首族群隱然潛在的改變。就是由兩類人士成爲文壇主導。一是作態名士，一是洋場才子。這類詞彙已毫不新鮮，五十年前阿英討論晚清小說已昌言之。我們須知這是真正的近代文學嬗變骨子根莖。王韜原是老牌子正宗的作態名士。後來當錢玄同旗幟鮮明的大書攻伐「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之時，也正是作態名士完全敗退出局之日。不知前軌，怎能會看清後塵？

在此並非要涉談文學領域，必須仍引入本題，探討王瀚早期一段文藝心性之表現。代表上海開埠初期，邊緣性口岸文人之生活狀貌。

中國文官考試只限於進士、舉人兩階，有進入仕宦機會。秀才、生員只是初階資格，不能進入政府任事。但已具學者頭銜，受社會尊重。無論年齡大小，均可設帳收徒，做爲塾師。王瀚志識豈有歧異，惟家道清貧，鄉里又遇水荒，只好遠赴上海，奔走衣食。恰值上海開埠，遂給予有利求活機會，真是所謂運會使然。^①

王瀚旅滬求活，始終視爲暫局。希望一日賺足貲財，返鄉買田構屋，可以息影林泉。此皆屢見於王氏自述，確足憑信。惟以王氏徵逐酒色，不能自制，寅吃卯糧，借貸度日，何嘗能有豐足之日。而此區區素願，亦竟成爲空想。然於此段上海之顛沛境遇，浪跡心情，游戲人生，竟亦留下雪泥鴻爪，俾後世學者藉以考鏡口岸士風以至文藝嬗變之濫觴。

王瀚生平著作，段落分明，雖是多采多姿，實具時序重心。本文畫定界限，只論王氏酒色風流一面，自是截斷眾流，不及其他。雖然如此，亦非以游戲爲宗旨，但望後世有所取資。

王瀚一生有關仕女筆載，兩性著述。以早年所作為可重可貴，具時代參

^① 王韜著，《漫游隨錄》卷一〈黃浦帆檣〉：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大水，硯田亦有惡歲。六月先君子見背，余不得已橐筆海上。自此一出，遂與故鄉久別矣。

考性。其愈晚時代者，價值愈低。早期代表，則有《花國劇談》及《海陬冶游錄》兩種最爲重要。中期作品則有《漫游隨錄》、《扶桑游記》最具價值。後期者則《淞隱漫錄》尚有可取，而《遯窟譚言》則純爲杜撰妄造，羌無故實。本文將少加參考。

王瀚《花國劇談》完成於咸豐二年(1852)，其內兄楊引傳讀到即來信規諫。王氏於九月十七日記下自己的觀點，頗值參考：

是日得莘圃書壹函，勸余屏綺語而歸禪旨。然余作花國劇談一書，大旨亦無詭於正。以文人之筆墨，爲名妓下鍼砭，浮雲在空，明月滿地，一片虛無，反屬幻境。但法禿見之，不免詆呵耳。^②

《花國劇談》共爲二卷，爲當日實錄，並非小說，應是史載筆乘。嚴格言之，可視爲名姝傳記。共收當時上海地區名妓五十六人，每人一傳，而各具一定描述重點。今日看來，無別於婦女傳記。全書爲真人，大致爲真事，而重點俱偏於閨房私情。其實當時婦女有何大事可記，凡我後人應無可責言。不過在此必須點明，楊引傳也是秀才，何以戒諫王氏。質言之，王瀚所爲是違背正宗教化，趨向市井下流。在當世小儒而言，是離經叛道。民國初年不是有人高唱文學革命嗎？如果要把精神轉到下民生活寫照去著墨，不管後人承不承認它是文學，近代風氣開始，必須從上海開埠以來去考察。須知王瀚纔是先驅宗祖。

就文學而言，《花國劇談》充滿旖旎風情，卻非前代傳奇小說可比。在文學上若定要指出前軌，則前代之文人筆記或真或假，或真假相參，庶乎相近。我人姑以人物筆記待之。而真人真實事物，雖不免瑣屑，實具有可能之時代代表性，流傳後世，彌足珍視。尤其市井文學資料，必須善加利用。

《海陬冶游錄》爲王氏早期第二種女性著作。更爲重要。此書正錄三卷完成於咸豐十年(1860)，當年文家龔橙（字孝拱，龔定庵之子）讀到，曾向王氏查訊，王氏在四月初三日(1860.5.23)有記此書情形：

孝拱見余所著《海陬冶游錄》，問曰：今日可能按圖索驥否？余曰：自遭亂之後，風流雲散，芳訊頓杳，此編只可當作白頭宮人談開寶繁華耳。時已黃昏，孝拱特呼廚娘添肴煮酒，把杯劇話。^③

^② 王韜手稿，《瀛壖雜記》，《蘅華館日記》之一。

^③ 《王韜日記》，頁167。

此一時期固自包羅王氏早期旅滬之十三年，而再過十七年，王氏又補寫《海陬冶游錄》附錄三卷，餘錄一卷。合成七卷。所跨時期又增加同治時代，包羅至光緒三年，而合刊於光緒四年夏(1878)。²⁴

《海陬冶游錄》前後共七卷，各卷所含價值意義不同。前三卷成於咸豐十年，著錄璇閨女子傳記三十一人，俱王氏親歷熟見人物，所寫真人真事，情節動人。往往親身接觸，對話調情，筆觸亦真摯可信。更重要者，其中有六位曾與王氏有枕席之親，具繾綣共效于飛之情。此六人者，即為一：繡雲字琴仙。二、采芳及彩玲姐妹花。三、巧福。四、璇姑，乃粵商之妾。五、小玉。六、廖寶兒。此中以廖寶兒與王氏相暱最密，來往最多，用情最深。王氏曾為其家用一次贈銀二十兩；廖氏喬遷，王氏則助以錢二萬緡。以當日生活計，平民衣食每戶不過用銀二兩左右，當時綠營世兵，每月亦只二兩五錢，用以養家活口。咸豐時期，湘軍月給四兩二錢，近人稱為待遇最優。王氏一擲二十兩，顯見手面闊綽。至王氏酒食徵逐，多受他人款待，惟遇及出資請客，必多記下數字，一般以付出青蚨一千餘已是豪舉，日記中屢記而不多見。可一次擲出二萬緡者，足當此等豪舉近二十次。故而值得一記。然王氏旅滬之患貧，其來由可知也。然即《海陬冶游錄》一書而言，此前三卷足當時代代表意義，有史料價值。

《海陬冶游錄》附錄三卷，內載上海名妓個人專傳七十一篇，餘錄一卷，內載上海名妓個人專傳二十三篇。這兩部分之近百名媛，俱是王氏離滬之後代表人物，均非王氏親身接近，而是得自於上海文士之互相傳聞，多據文字流布而獲得，雖然如此，亦必真有其人，但是否真有其事，則不能保證如王氏親記直述之可靠。惟其具另一種風格，是即品題高下，各家詩文題詠較前更踵事增華。或十二名媛，二十四詠題，乃至仿紅樓夢十二正冊、副冊、又副冊之方式，形成風氣，各領風騷，而名媛身價亦因而抬高。遠較昔時繁華熱鬧。王氏自知後有來者，青出於藍，樂得一一收載，壯大篇幅。《海陬冶游錄》之附錄、餘錄，內容多在傳述上海文人之各類風騷詩文，且以品題名妓為宗旨。

在絃絃名媛中有一位值得一提，蓋常見於《點石齋畫報》以及李寶嘉（伯元）之小說中，往往提及上海名妓林黛玉，可以代表清光緒年間上海第一名

²⁴ 王韜撰，《花國劇談》自序。

妓。我人當然相信實有其人，惟若不細檢王氏《海陬冶游錄》附錄，則將無法測知林黛玉之得名緣由，亦更不知所指為誰。翻讀王書，則知此人實即李佩蘭。自光緒初年經風月文人多方推重，評為上海名媛之冠。自是名揚遐邇，成為一代名姬。²⁵

王瀚早期在滬生活，一面自是杜陵窮瘦，艱困衣食，一面則是周旋眾香，風流雋賞。惟在其詩文表達之間，則已充分留存可資研考之種種可信資料，於文字流變，口岸社會風氣，均具潛在之解析功效。

三、黃畹公案，遁隱香江

黃畹上書太平軍一案，於太平天國史之研究價值微不足道，本來不值浪費精神討論此一問題。只是在民國初年，史學界辨偽及考據之風盛行，正好此一問題小而具體，最合當時學者胃口，竟有一些著名學者參與研討，其中當然使太平天國史專家也群趨探索。為此而有羅爾綱所撰〈黃畹考〉，謝興堯撰〈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事跡考〉，洪深撰〈申報總編纂長毛狀元王韜考證〉，趙意誠撰〈王韜考證〉，吳靜山撰〈王韜事蹟考證〉，簡又文撰〈關於王韜〉，甚至胡適也認真參與考證。顧廷龍代覓王韜崑山縣道光二十五年考生榜名。形成太平天國專家中最熱門問題。今日看來，直覺其小題大做，浪費人力。更是看到考據家本領不過爾爾，令人失望。

研究太平天國而做此小題，可謂無聊透頂。未料過五十多年後，大陸上又有不少人在炒熱此一未成問題之問題。好像前人工夫全是白做。又在辯論王韜是不是黃畹這類疑案。當然有所敬重的李景光先生所撰〈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的幾個問題〉，王開璽撰〈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之我見〉，吳申元撰〈王韜非黃畹考〉，楊其民撰〈王韜上書太平軍考辨——兼與羅爾綱商榷〉等文。真是多餘的浪費。民國二十年代成為一時風氣，多可找出一些環境因素。主因在於太平天國史這門學問的開關，幾位大師級學者，形成此門學術權威，問題不論大小，總須弄個清楚明白。此是學術風氣使然。六十年來，若無新聞

²⁵ 王韜著，《海陬冶游錄》附錄（光緒四年夏，眉珠小盒印），卷下。

題開拓，亦無必要重新拾起這類無關宏旨的黃畹上書公案，重新炒熱。^{②⑥}

本文既然如此批評前人，何以仍要列為專節討論一番？乃是就王瀚個人之研究言，情況自具重大意義。黃畹上書案對於太平天國史並不重要，對於王瀚言，則是一生重大轉捩點，此一轉折，完全改變王瀚後半生。若要研究王瀚個人，自不可不有所交代。本文絲毫不討論黃畹上書內容，以至王氏用心如何，而是要就罪案發生後，對王瀚的嚴重打擊與影響，要作一番了解。若要研究王瀚，即無從逃免。

黃畹上書太平軍，其人無可懷疑，就是王瀚化名，也就是後時之王韜。王瀚因此案之後改名王韜，永不再用王瀚之名，段落十分清楚。王韜向來也不會用王畹一這名稱，賢者之紛紛考證，一意認為王氏昔名王畹，自是錯誤結論。但若承認黃畹應是另有其人，也是錯誤。正確答案：黃畹是王瀚化名，其上書就是出於王氏之手。對於太平天國毫無影響，對王氏個人則成為一生命運之筭鑰。大大關係到王氏歷史地位。

黃畹上書太平軍公案，當同治元年二月案發，清軍於克復上海附近七堡（王家寺）太平軍營壘，搜獲黃畹上太平軍逢天義劉肇鈞書。^{②⑦}三月十三日（1862.4.11）江蘇巡撫薛煥將搜獲文件上呈朝廷，隨即形成緝捕黃畹一案。

其時上海道員是吳煦，承其部屬建議，已作誘捕之謀。當時在三月杪有署名「蛾術齋」者，向吳煦獻計云：

黃畹投書導賊，設計殊毒，此人行蹤詭秘，難保不潛行赴滬，倘能擒獲最妙，否則設計間之，亦可除一大害，高見以為如何？^{②⑧}

此是誘捕王瀚之先聲。不久在四月十一日（1862.5.9）即有江蘇巡撫薛煥（雖已任李鴻章接任，而適交替中間，薛氏任用舊銜）將三月二十七日上諭朝廷捕拿指示，下札蘇松太道吳煦，令其速加緝捕黃畹其人：

^{②⑥} 近年諸作較具功力而探討深入者，有：王開壘撰，〈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之我見〉，載《近代史研究》，1988年，期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88年5月），頁270-279。又有李景光撰，〈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的幾個問題〉，瀋陽《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期四。俱值得參考。

^{②⑦} 陳其元著，《庸閒齋筆記》，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排印本），頁297。所述陳氏本人當時曾在薛煥幕府親自讀過黃畹書。又，《文獻叢編》，期二十（北京：故宮博物院，民國二十三年刊）〈太平天國史料〉，清廷誘捕黃畹事。

^{②⑧} 《吳煦檔案選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印）第二輯，頁318。

逆黨黃畹爲賊畫策，欲與洋人通好。設其計得行，於軍務殊有關係。聞該逆稟內，於洋人多醜詆之詞，業經薛〔煥〕飭令吳煦告知英、法領事破其奸謀，仍著薛〔煥〕會商曾〔國藩〕、李〔鴻章〕妥爲辦理。至該逆所稱派撥黨與赴洋涇濱潛住，并勾結游民作爲內應，計殊凶狡，并著李〔鴻章〕、薛〔煥〕嚴密防範。黃畹是否現匿上海或竄赴他處，著曾等迅速查拏，毋任漏網。²⁹

陳其元爲當時人，九年後任上海縣令，所記吳煦誘捕黃畹未成，實因英人插手格阻，並非不知黃畹即是王瀚化名。而錯在陳氏未舉王瀚之名，遂使後人疑誤，考辨不休。當日王瀚命賤如雞，官方捕拿治罪豈有困難。其事竟被洋人從中作梗，王瀚區區窮儒，非有赫赫名位，何至勞動英國官方至領事公使出面保護。頗值探究。其實就民國二十三年《文獻叢編》二十期所公布英國公使卜魯斯(Sir Frederick W. A. Bruce)在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1862.9.13)致恭親王照會，即可見出此中曲折關鍵，此照會極具關鍵意義，願抄錄一段，供作質證：

前於六月初五日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王瀚即黃畹，號蘭卿，據該地方官指稱爲賊畫策，現有通賊信據，經請上海領事官麥交出訊辦。該領事未肯解送，希即照復等情。准即割行麥領事速將王瀚各節細爲詳報，以備查核去後。茲於本月十三日始接申復。查此案上海道吳稟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雖已閱悉，惟以事中尤有要處，該道未經詳細申報，貴衙門不及盡知。蓋我墨海書館，除傳教外，仍備天文藥方各等部類之書，王瀚向在館幫辦筆墨，已照多年。近離上海回籍，本村已爲賊踞之地，王瀚家眷自亦落賊網，後因墨海書館仍請回滬，再爲作幕。王瀚亦願回來。東家慕惟廉慮其近在賊境內居，此番回滬，難保不致官疑。思此預向上海道探詢，王瀚旋館，可否妥保無虞。吳道即以蘭卿如肯重來我處，定當妥爲位置等語答復，現有四月初八日原片可據。惟黃畹僞稟逆首之函，係二月初一日所具，相隔兩月之久，其克復王家寺賊壘，搜獲信件，亦係三月初六日。即此可知吳道出保片時，已知有僞稟之件，是欲將王瀚究審，因鞭長不及，設法出其保片，架言妥爲位置，誘其回

²⁹ 同前引書，頁334。

滬，以爲拏辦之地。似此陽利陰害，詭譎爲謀，殊爲失信無恥。更有可惡者，是己不能專成其事，藉我英國堂堂俊秀之人用遂其欺，將素爲家中所用之之人害其命。俟其陰謀敗後，呈稟貴親王時，只將尋常案件之由敘入。其欲令外國幫助行欺之事，係格外情節，特有心含混，絲毫並不提及。麥領事官既燭破其奸，即以願將王瀚送出地界，嗣後如敢自回，本領事官決不能代爲分解等語答與吳道。^⑩

解讀這段史料，最能了解淵源曲折，表現上海地方官誘捕黃畹之用心。吳煦原計假英國教士慕維廉 (Rev. William Muirhead) 之招聘王瀚，乘機拘拿歸案。未料此種官僚手段，正好使事端複雜化。王氏既承慕維廉聘僱，慕氏自然須承擔王氏安全。反而促使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把王瀚帶到領事館藏匿，設法把王氏安全送離上海。此一黃畹公案，終因麥領事捲入其中，而造成中英兩國間最高層交涉，即王瀚個人亦夢想不到。此外，卜魯斯也於八月二十九日 (1862.9.22) 將交涉情形報告到英國外務部，給外相羅素 (Earl Russell) 有信說明。^⑪

^⑩ 《文獻叢編》，期二十（北京：故宮博物院，民國二十三年刊），〈太平天國史料〉，清廷誘捕黃畹事。

^⑪ 英國國家檔案局 (Public Record Office) F. O. 405/9, No. 149, pp. 118-119. Peking, Sep. 22, 1862, Mr. Bruce to Earl Russell: I have the honour to inclose the reply of the Prince of Kung to the letter I addressed him on the subject of the prisoner Wang Han (王瀚), together with my rejoinder. The Prince is considerably nettled at my remarks, which he looks upon as charg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inhumanity towards its subjects. This is a serious reflection where, a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is based on the paternal relation. He meets the charge by referring among other things to the late proceedings of Tsung Kwo-fan (曾國藩), which are detailed and approved of in the accompanying Decree published in the "Peking Gazette (京報)". There may be some exaggeration in the numbers, but I have no doub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men, forced into the ranks of the rebels, have returned to their allegiance, and have been humanely treated. The fact of their hair having grown long shows that they must have served for some time. Such of them as belonged to other provinces have received passes and money to enable them to return home, The mode of dealing with the leaders is characteristic. In other countries these men would have suffered death, here they are allowed to clear themselves by performing an important service against their former associates, and receive rank as a reward. We should not consider that a man who had been a rebel redeemed his character by volunteering to act against his brother rebels. But rebellion, according to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s

英公使卜魯斯進一步更在同年閏八月初一日(1862.9.24)再致照會給恭親王，對於恭親王有所辯駁。俱可見出英官所持理由：

至於王瀚一人，前次去文內稱該道設法陽利陰害，詭譎為謀，不便幫助行欺等詞。本大臣今准復文，細察其意，仍無使我變更之理。蓋前文所指王瀚有無通賊之據，本大臣毫不置議，只以該犯尚在逃時，該道未得自力查辦。因欲拏究，故作如肯重來我處，安(定)當妥為位置等字保片，發給外國之正士，憑此引誘該犯回滬，迨其旋復，該道派役查拏，如此計策，本大臣所謂失信無恥。否則慕維廉赴道署稟問，吳道當以王瀚已有犯案，難免拏問等言批復。此本大臣所謂忠直之批，嗣或王瀚仍肯回滬，只伊狐(孤)身冒險，並道外國人代奉道保之論。總之，本國軍兵保衛上海縣城、甯波及各等處亦已克復，交與官兵防守。惟此王瀚一人，未得交官，或使天下悞度本國同賊一意，欲將賊匪包庇乎？諒天下人亦必無此見也。此案本大臣不便隨同助辦，只緣吳道此舉，無非暗謀險(陷)害，未昭公正。甚至礙於本國忠信之稱。^⑳

parricide, and the crime is most effectually expiated by some signal service. A man's reputation does not suffer here by such acts, nor are they looked upon dishonourable.

(以上引文約原文三分之一)

^⑳ 《文獻叢編》，期二十，〈太平天國史料〉，清廷誘捕黃畹事。又，Public Record Office. F. O. 405/9, No. 149, p. 120, Inclosure 3, Sep. 24, 1862, Mr. Bruce to the Prince of Kung:

“I have the honour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your Imperial Highness' reply to my letter on the subject of Wang Han.

It is not always a pleasant thing to state facts, and I never allude to matters that may give rise to unpleasant discussions without a practical object. But where good may result it becomes a duty of friendship not to be silent, I am desirous to see the restoration of tranquillity in China, and I stated on good authority, that many persons are deterred, from returning to their allegiance from the dread of being called to account for their past deeds. I therefore urged the publication of an amnesty which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reign would have a good effect,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acting with tenderness and humanity towards many men who have joined the rebels, not because they like them, but because they were in their power. This suggestion I believed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hina, and with the disposition of your Imperial Highness.

It is with much pleasure that I have received the account given by your Imperial Highness of the judicious course pursued by his Excellency Tsung Kwo-fan (曾國藩),

此事至為顯然，英方為避免陷害王瀚惡名，決計不理會清廷中央及地方要求，一意保護王瀚，將之隱藏於安全地方。王韜日記所見，是即上海英國領事館，自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直至閏八月十二日(1862.5.23 ~ 10.4)，王瀚一共藏匿一百三十五天。^③ 當其隱匿英領署，曾作仿蘇東坡獄中詩，寄鄉中摯友楊引傳。舉列如次：

倉皇烽火逼殘春，蹈死孤臣敢惜身？報國空陳平賊論，辨冤誰是上書人？早拚骨肉填溝壑，妄冀功名崇鬼神。一切恩情盡灰冷，君親好結再來因。

燈盡宵長夜雨淒，漸親廝養首頻低。書來此日凭孤雁，腹痛他年奠隻

and have read that his conduct has been approved by his Majesty.

The insurrection will lose much of its strength when it is seen that there is pardon for those who rep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d vigour in the field.

With respect to the prisoner Wang Han, I am unable to find anything to change the view I have expressed about him. I do not enter into the question of his guilt. It is sufficient for me that he was not in the power of the Taoutae (道台); that the Taoutae wished to get hold of him, and that to entice him, he gave a paper to a British subject, the meaning of which is that he is not to be molested; and that having induced him to come back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is foreign gentleman, he then attempted to seige him. If the Taoutae had acted in a straight forward manner, he would have told the gentleman who applied on his behalf that there was a serious charge against him; and had he done so if the man had come back it would have been at his own risk.

Her Majesty's troops are employed in protecting Shanghai (上海), and have retaken Ningpo (寧波) and other places, and handed them over to the Imperialist forces. No one, therefore, can suppose, if this man is not given up, that it is from any sympathy with the rebels, or any desire to harbour their adherents. But I cannot acquiesce in what in my eyes is an unfair and treacherous proceeding of the Taoutae's and which involves the honour and good faith of Great Britain, and I regret that Your Imperial Highness does not see it in the same light.

I know my country, and am aware that I should do the cause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much harm where I do direct the ma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o be handed over the Taoutae."

本文兩處舉證英文資料，不厭其詳，主要因為係檔案原件，一向未經披露，須直接引括，取信學界，以免盜欺之嫌。

^③ 《王韜日記》，頁195。同治紀元歲次壬戌四月二十日（5月18日），抵滬，得見慕君維廉，即住黃春甫（錚）家暫住。二十五日（5月23日），至麥領事署。從此閉置一室，經一百三十五日。

雞。地下驚魂招弱弟，江邊收骨仗貧妻。比鄰杞菊成虛語，合葬天隨舊宅西。^⑭

王瀚遁匿上海英領事署，地在上海城外，近黃埔江與吳淞江口，乘船外逃，自甚便宜。麥華陀為王氏安排遁避之法，即使乘船逕赴香港，在港安置寄命之所。於同年閏八月十一日派教士麥高溫 (Rev. John McGowan) 帶其搭乘怡和洋行火輪船魯納號赴港。於十二日 (10.5) 啓碇放洋，十八日 (10.11) 抵達香港。^⑮

王瀚此次隻身逃港，避地求活，以為永世不得回鄉，記掛妻女無人照料，於行前作書，託身後於楊引傳。棲遑哀怨，茫茫無所計其未來，有似絕筆書：醒寢執事：閉置一室中一百三十五日矣。坐臥飲食之外，了無所事。儼然獨居，惟與廝養相親。即欲憑几把卷，而愁痛壅集，每不能竟數葉。此生已矣，分與世辭矣。昔中散養生，終櫻禍網。平原違里，遂被讒言。韜志在巖阿，心於邱素，苟得二頃田萬卷書，即欲杜門謝事，采芝餌朮。天特厄之，致斯奇困。此寢寐中未及料者也。疑生投杼，冤至覆盆，不思從中之或有嫁名，反以局外者居為奇貨。當路勢位烜赫，固無難指龜而成鼈，淆素以訛緇。欲戮一細民，亦何求而不得？茲雖西官力為周旋，為之請於彼國駐京公使。而當事者轉益其疑，獅搏兔以全力，犬委虎而無生。轉輒籌思，分無免理，後其所先，急其所緩，措施如此，事可知矣。嗚呼！即使韜銜冤斧鑕，飲恨刀鋸。於正典明刑，攻城殺賊亦何所裨？徒成殺士之名，自居忌才之實。此堪憤而又堪笑者也。韜今年三十有五，已逾一世。才淺識寡，生固無補，死亦何恤。況復慈親棄養，骨肉漸凋，於世無所冀戀。買地建塋，卜壤歸骨，見後

^⑭ 同前引書，頁 210。四月二十五日，猝中奇謗，索予者甚急，遂避西人公廨，閉置一室中一百三十五日，分無免理。和東坡獄中遺子由詩，寄里門補道人（即楊引傳）二首。

^⑮ 同前引書，頁 195。閏八月十有一日。辰刻，麥君高溫（即麥嘉湖，Rev. John McGowan）來，述麥領事盛意，令余即刻前往香港，因循至怡和行魯納火輪船，英人密司懇開亦同去，待余之厚，殊可感也。是日，以未得稅單，不啓行，同舟者殊不少，有台州人徐雲溪曉峰，原名旭，係福建汀漳龍道，由軍功保舉，附輪船詣福州赴任，隨行二十六人，中有江寧人范春泉祖洛，係福州縣尉，其弟鏡秋皆彬文爾雅。他如蕭山人魯獲洲希曾、許識齋，亦善談，舟中得此，頗不寂寞。十有二日。巳刻，啓行。余此行倉卒登舟，一物未攜，窘苦萬狀。輪船行大洋中不甚平穩，風浪恬和，頗暢眺覽。

之事，於君是託。相知有素，想不負我。阿荅君之是出（長女荅仙，妻夢蘅所生），俾得所歸，尤為無憾。^{③⑥}

王瀚自此易名王韜，字仲弢，號子潛，乃完全轉移於另一新生命階段。變化突兀而嚴酷，起伏於生死存亡之間，此真正王氏生平一大轉折，論世知人，史家自當予以充分表述。

王氏於閏八月十八日到港，當天即住進中環英華書院，會見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由此時起遂以理雅各為居停主人。不期然而長期遁居香港。同年十二月初八日（1863.1.26）王氏妻冷冷，易名懷蘅，女荅仙、稚仙均自上海航海抵港。一切用度皆出於慕維廉牧師及好友黃春甫醫生之協助。王氏感激萬分。^{③⑦}

四、東西漫遊，結緣異域

王韜寄居香港，備書於理雅各，佐其繙譯中國典籍十三經。雖是飄泊南陲，其地為英人開闢，頗大力經營，儼然成一海上都會。島居雖狹，開埠未久，人口尚未擁擠，王氏所居中環之地，適即港島繁華之區。且王氏已受聘於理雅各，家用衣食，尚不窘困。惟是昔日交游，俱同隔世，只有在香港陷於舉目生疏之域。

王韜逋逃，婉轉求生，雖無端遠播香港，豈生平始料所及。此固命宮魔蠱，天忌文才。實則計慮之外，使王氏又添廣闊生機。既走盡窮途末路，卻更見柳暗花明。

理雅各任英華書院山長，頗熱愛中國典籍，立意將儒經譯成英文。慕維廉為挽救王氏性命，即介薦予理雅各，使之前赴香港，佐其譯書。王氏不惟再獲生機，實更得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其於學術影響自不待言。本文且勿具論，惟願於其嚴肅之學術問題以外，略為探討王氏身影所屆，周旋於異國仕女之間，其行徑與所流露之處，尚可追考其心性修養與才華表現，在其一生活動

^{③⑥} 王韜著：《弢園尺牘》（光緒二年九月活字版排印，天南遯窟藏版。台北：大通書局影印）卷六，頁10-11。

^{③⑦} 《王韜日記》，頁201。又，有關黃畹公案，大陸上持平而論，具學術參考價值者，有王開璽撰，〈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之我見〉。

保留幾分姿彩。

王韜在港工作，第二年即完成《毛詩集釋》三十卷，呈交理雅各。^⑳自是博得理雅各之讚賞，亦更堅信王氏之才學。自此以下之七八年期間，一直與理雅各有密切關係。生活因而得以安定。

惟王韜旅居香港，原以為暫時避難，背井離鄉，不似上海之隨時可以返里探親。雖滿心飄泊情懷，亦不能不求隨遇而安。未料輾轉遷延，旅港為家，竟達二十三年之久。自同治元年(1862)離滬，直至光緒十年(1884)再回滬定居。又足以代表王氏一段放逐段落。其中所佔王氏生命中三十五歲至六十歲之壯年階段，應是正有表現與其提具貢獻之年代。質言之，應是王氏生平之黃金時代。

大凡研析王韜思想，其作品均集中於旅港時期。若論創辦《循環日報》，亦表現於此一時期。自是十分重要，近世言之者眾，不擬再加涉論。惟譯書之職，甚值注意，就本文論域所需，亦必割捨。在此未免避重就輕，偏要追考一番王氏一些海外游歷行踪，抑特亦集中於詩酒風流文士故態。

理雅各在港主持英華書院，較難專心從事繙譯，計欲邀王韜赴英，俾得一同全力從事，故在任期屆滿，辭職回英，約定安排王韜作訪英之行，並在英進行繙譯中國經典，其事在同治六年(1867)。安排妥當，於是年函約王氏赴英，訂下輪船客艙，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1867.12.15)啓行，直放歐洲。自是開始其海外遨遊。

行船四十餘日，先至法國馬塞港登陸，然後乘火車至巴黎。受到法國漢學家儒蓮(M. Stanislas Julien)熱忱款待。同治七年(1868)初抵達英國倫敦，進住於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家，此後受英國友人輾轉接待，居止不一。交往亦繁，雖身在異域，實受廣泛熱忱接待。^㉑

王韜在英，初居倫敦，於當日英人禮俗習慣，居住飲食，房屋道路，游息娛樂，無不留心觀察，多所慨歎。而游於英都，到處備受尊重禮遇，給王氏極大慰藉。故具深刻印象。無不驚歎英國政教制度，科學發明，機械製造，建築藝術，園囿林泉，無不稱美讚譽，極力介紹，其游歷西國京華，可謂大開眼

^⑳ 王韜著，《弢園尺牘》，卷六，頁15-17。

^㉑ 王韜著，《漫遊隨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印），頁65-98。

界。^⑩

王韜息游倫敦半載有餘，多受旅華教士商人輪番款待，而主要居停主人仍是理雅各，導之漫游名勝者則係理氏第三女媚梨(Mary Legge)。^⑪王氏於將赴蘇格蘭之前，於其來歐之行，有一概括性描述，其詩有云：

一從客粵念江南，
六載思鄉淚未乾；（同治元年至六年）
今日擲身滄海外，
粵東轉作故鄉看。（因其家書來自香港也）^⑫

其文有云：

噫！余處境雖危，而游覽之奇，山水之勝，詩文之娛，朋友之緣，亦足以豪。幾忘其身在海外也。^⑬

王韜於同治七年七月轉到蘇格蘭游歷，正值慕維廉自上海返英渡假，得以相見於慕氏故鄉。慕氏與理雅各同為蘇格蘭人，相偕導游，使王韜更感賓至如歸。

王氏在蘇格蘭之一段時期，傳食當地好客之家，至少有理雅各、慕維廉，再加湛約翰(Rev. John Chalmers)亦退隱在家，均與王氏交往多年，各盡地主之情，分帶各地，招集親朋歡迎王氏。其較在倫敦不同者，王氏一到蘇格蘭首府挨丁濮，即有報紙刊載王氏到來與學界見面的消息。戴以東方學者之尊，使王氏倍感榮寵。

王氏原在上海傭書西士，繙譯聖經，始終不過是文人自居，以詩酒風流自遣。惟自遁避香江，仍供譯事，則情有不同，先在上海係以西譯中，王氏未嘗用心理解。及在港隨理雅各繙譯十三經，是以中譯西。使王氏可盡供所學，表現其治學素養。雖未能脫文人習性，西人見之，儼然視為東方學者。初始到英，曾被邀至牛津講學，首次得到肯定。及到蘇京挨丁濮後，更有數度登壇講

^⑩ 同前引書，頁99-123。

^⑪ 按王韜一生著述，筆下所書女子名媚梨者，皆為西國之人。實Mary譯音，然不同時期，非指一人，所能確知者，最早者為麥都思之女，其次則為理雅各之女。王氏另有媚梨小傳之作，有似虛構，或即指此一媚梨。

^⑫ 王韜著，《漫游隨錄》，頁126。

^⑬ 同前引書。

學之機，至此遂得肯定其學者地位，真王氏重大收穫。^④

王韜於講演之外，另一重要表現，使其更受肯定而具東方學者風範者，則爲其向西人表露之朗誦詩。亦俱在旅居蘇格蘭時期。計於女友愛梨家朗誦《琵琶行》，於富室司蔑氏家朗誦吳梅村《永和宮調》。於蘇京挨丁濮講演兩晚，每次各朗誦《琵琶行》，及李華之《弔古戰場文》。於濟貧午餐會中朗誦唐人《貧女詩》。^⑤ 凡此機遇，雖近今學者亦不可多得，亦未必真有能朗誦詩之如此多次者。自當於此強調陳敘。

王韜風流蘊藉，才華洋溢，游歐初居倫敦半載，見及西方仕女，親切大方，坦朗開放，大開眼界。然未嘗自作多情，蕩檢踰閑。及轉往蘇格蘭周游北國。在理雅各、慕維廉故鄉親朋好友之家備受禮遇，一住兩年，直至同治九年(1870)初再返倫敦，整裝返回東土。此兩年中頗有西方家庭來往，會見名姝不少。惟與交往最密而具相當友情者其一爲富家士班時(Spencer)有女愛梨小姐，年方十五，王氏數度居住其家，愛梨無所拘男女之嫌，王氏頗生愛慕之情，二人互有餽贈。其二爲周西魯離女士。年僅十七。魯離其姓也。王氏以爲在蘇二年以此姝爲最熟稔。過從甚密，周西常常駕車偕王氏出游，穿梭森林山水間，調笑奔逐，攜手並肩。王氏深懷慕戀，彼此互有遺贈。王氏記愛梨有謂：

士班時夫人產自英倫，明敏持重，有大家風。其長女公子字愛梨，年十有五。聰警絕倫，工琴能歌。作畫俱得形肖，人物栩栩生動，幾與北宋苑本相埒。以平日畫就一冊相贈，謂展畫圖如見其面，愛梨妍質羞花，圓姿替月，固世間慧心妙女子也。^⑥

王氏多次記述周西，而於王氏離蘇南返，作東歸之計時，記敘相別依依，亦足見出王氏之用情：

將去蘇京，女士周西魯離來送行，謂「自此一別，不知相見何時？」特摘頭上髮辮作連環縲相貽，爲他日睹物思人之據，云見此如見其面。予嘗贈以一衣，約金錢十有八枚，女士以其華麗逾分，初不敢服，至

^④ 同前引書，頁99-100，133，146，159。

^⑤ 同前引書，頁148-149，159-161。

^⑥ 同前引書，頁147。

是乃服此裳衣，照一小像以贈余，驚鴻豔影，殆足銷魂。女士執手言別，雙眸熒然，含淚將墮，不欲余見，潛自拭去，顧已嗚咽不能成聲，但道「珍重」二字而已。^{④⑦}

王氏記敘與英國女士過從，雖不免芬芳悱惻，旖旎動人，實則是發乎情止乎禮儀，交游雖密，未及於亂。王氏當時四十開外，已閱世很深，西國主人款待之親，敬重之隆，使之亦須自重自愛。尤重要者，王氏在英兩載，久熟其禮俗固自質實，人品實自高尚，亦足使王氏肅然起敬，乃有以下嚴正之記述，所指示正是周西一家。

余之至埃丁漢也，主于紀君家。每蒞訪友人之舍，悉皆倒屣相迓，逢迎恐後。名媛幼婦，即于初見之頃，亦不相避。食則并席，出則同車，觥籌相酬，履舄交錯，不以爲嫌也。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潔其心，秉德懷貞，知書守禮，其謹嚴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干也。蓋其國以禮義爲教，而不專恃甲兵，以仁信爲基，而不先尚詐力，以教化德澤爲本，而不徒講富強。歐洲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即如英土，雖偏在北隅，而無敵國外患者已千餘年矣，謂非其著效之一端哉！余亦就實事言之，勿徒作頌美西人觀可也。^{④⑧}

此論正見王韜表達對當代歐洲之讚譽，且亦證明其識見之開拓與思想之敏悟。於王氏回港之後創辦《循環日報》，發抒變法言論，介紹西方政教，改革中國弊政，仿效英法政制。均有密切關係。

王韜於同治九年春由蘇格蘭再至倫敦，周旋於英國仕紳之頻頻款接，幾至日無暇晷。實王氏旅英所受隆禮之高潮。隨後即搭輪東返，其時正值普法戰爭，王氏不能多所勾留，匆匆返回香港，結束將近三年之西歐游訪。

王韜羈港二十三年，爲其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此爲常識，勿須多論。惟其游歐三年之外，又有機會東訪日本。時在光緒五年三月初九日至七月十四日（1879.3.31 ~ 8.31），計五個月（內中有閏三月須計在內）。爲期雖短，而活動頻繁，接觸廣泛，內容充實，王氏留有記載，足備研析鑑賞之資。

王韜東游日本，係受日本學者邀請，一切旅行費，爲日本友人擔負，而

^{④⑦} 同前引書，頁 159。

^{④⑧} 同前引書，頁 135。

花用自不待解囊。王氏當時留下其所寫《扶桑游記》，在結束訪日之際，即留交日本友人栗本鯤（字鋤雲，號匏庵），初計即要刊印問世。內有當日活動情景，並有豐富詩作。其所能傳世最可珍之點，則在於反映當時日本文人學士社會風氣，其價值永不可磨滅。惟本文將不涉談此一範圍。

日本學者何以要邀請王韜訪日，其中名流不下五六十人之多，基於何項原因，能使日本學界傾心於王韜，此最值得注意。大抵先有一認識印象，然後而生傾慕之情，而有邀約之舉。一般情況，基本上是嚮慕王韜文名。如其居停主人重野安繹言：

余嘗觀先生所著書，美其文藻，愛慕其襟度通儻，不規規乎繩墨，欲一相見請教。愿才遂，而一朝乖隔，憾可勝言哉！^④

又如中村正直言：

憶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齋几上始見《普法戰紀》。時成齋語余曰「聞此人有東游之意；果然，則吾儕之幸也。」察其意，若繾綣不能已者。^⑤

又見龜谷行言：

匏庵（栗本匏庵，號鋤雲）曰「吾聞有弢園王先生者，今寓粵東，學博而材偉，足迹殆遍海外。曾讀其《普法戰記》，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飄然東游，愿為東道主。」白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孤曾至南海，與先生善，乃有東游之約。^⑥

又如平安西尾言：

近日清國人士來游者日多，余亦往往與之納交；而胸襟洞豁與人莫逆者，獨推王君紫詮先生矣。余于先生一見如舊，情誼甚篤，文酒之會，每盡其歡。^⑦

又見岡千仞言：

《普法戰紀》傳于我邦，讀之者始知有紫詮王先生；之以卓識偉論，鼓

④ 重野安繹撰，〈扶桑游記序〉，載《扶桑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印）。

⑤ 《扶桑游記》，中村正直序。同前引書。

⑥ 龜谷行撰，〈扶桑游記跋〉。同前引書。

⑦ 平安西尾撰，〈扶桑游記跋〉。同前引書。

舞一世風痺，實爲當世偉人矣。⁵³

由前學日本學界筆載：可知彼人仰慕王韜已久，其關鍵在閱讀王氏之書。更具體言，是王韜所著《普法戰紀》流傳日本，引致極大重視。此亦顯見日人非盲目崇拜，其重大影響之處，在於王氏所著《普法戰紀》。我人指出此點，認爲是日人邀聘王韜訪日的根本動因。

光緒五年(1879)春夏之交，王韜赴日訪游，先後接觸日方學界六十餘人，最初並不相識，然一見既能針芥契合，又得開懷暢談。曾在三月二十五日(1879.4.16)一次重大聚會，飲酒論詩，滿堂日方俊彥竟有二十五人之多，一一與王氏接談。真有似古時蘭亭之會。茲將日方文人備列於下：

重野安譯，字成齋；折田彥市；平山太郎；小野長愿字侗翁，號湖山；藤野正啓字伯迪，號海南；鷺津宣光字重光，號毅堂；岡千仞字振衣，號鹿門；龜谷行字子藏，號省軒；小牧昌業字偉卿，號櫻泉；佐田白茅字藉卿，號茹齋；鱸元邦字彥之，號松塘；三島毅字遠叔，號中洲；小山朝宏字毅卿，號春山；大卿穆字穆卿，號學橋；河野通之字思卿，號荃汀；村山醇字大樸，號拙軒；木下真宏字叔毅，號梅里；西尾爲忠字叔謀，號鹿峰；豬野中行字尙甫，號熊梁；野口之布字士政，號犀陽；星野恆字德夫，號豐城；川口鬻字濯父，號江東；蒲生重章字子闇，號網亭；平山卓字立卿，號蕉陰；寺田宏字士弧，號望南。⁵⁴

相聚一席，各賦詩贈答，可謂英彥畢集，莘莘濟濟。然就日方文士習慣實定期一月一會，足以想見東瀛士風之醇美，王氏以詩人文彩使東人醉心，自是原有其深厚背景。嗣後王氏又得結識本多正納、島田重禮（字敬甫，號篁村）、秋月種樹、栗本鯤（字化鵬，號匏庵，別號鋤雲）、吉田次郎（字子全，號二酉）、吉田易簡（字君敬，號素堂，又號香竹）、增田貢（字岳陽）、小西義敬、藤田茂吉（名晦，字義卿，號鳴鶴）、中井弘（號櫻洲山人）、奧井賁（字莊一，號寒泉）、近藤市五郎（號米華堂主人）、近藤瓶城、藤野海南、中村宏毅、川田甕江、島宏毅（字子迪）、山井重章（字子幹）、藤醇處厚（號崎庵）、齋藤一馬、岡本監輔、奧田遵、鹽田園造、平

⁵³ 岡千仞撰，《扶桑游記》跋。同前引書。

⁵⁴ 王韜著，《扶桑游記》，頁194-195。

野藏、近藤源一、森魯直、佐川裡所、坂谷素（字子絢，號朗廬）、源桂閣、野田重次郎（號松橋）、狩野良知（字君達，號廣居）、池田豬之助、岩谷修（字誠卿）、矢士勝之（字竹海）、星野恆（字德夫）、木下真宏（字叔毅）、齋藤實穎（字裕三）、岡文治（岡千仞侄）等等，俱述與其晤會暢敘之情景，由是可見王韜東游所受日本學界之崇遇。尤其詩詞唱和，更能表露王氏才學，其能令日本學者競相結納者，真所謂詩酒結緣，代表中日文會之典型。

王韜東瀛之旅，為時雖只五個月，真可謂生平奇遇。與日本學者廣結文字緣，主人善待遠客，每每召藝妓侑觴，王韜亦必大展才華，且詳記各時不同情景，記注美姬色藝，多有贈詩題扇、書寫字幅。同時廣結善緣，群芳必留其名，可謂多情之至。計此五月期間，王韜所見歌舞侑觴之藝伎及品茗女侍，大約在四十個左右，最多次會見者有小勝、小鐵、阿玉、角松、小松、小雪、信吉、美吉、小千代、清吉、小紫、仲姬等妙齡藝妓。真乃青樓情聖，出入眾香之國。

王韜扶桑之游，年屆五旬，然在日本五月，枕席間必有侍姬。一登瀛島，在神戶即有阿朵相陪共宿。阿朵時年十七歲。王氏登陸東土，初到長崎即召妓名金鈴者共宿。繼在東京久住，先租阿葯共枕。王韜有詩記其定情云：

芙蓉綽約秋風裡，高臥秋江呼不起，
甘於水畔吐芬芳，羞在花叢鬥紅紫。
瘦腰專戀沈休文，濃消豔福輕桃李，
蓬萊已到尚思家，採葯不歸有王子。⁵⁵

未料詩稿剛成兩日，阿葯即不告而去。原因是王韜住處太狹不能容膝。王韜不久又結新歡，友人又介紹小玉陪侍。王氏一月之中兩姬相從，乃作長詩存記此情：

燕頷虎頭飛食肉，英雄貌自殊流俗，
瓶城本相天下士，特張吾軍氣亦足。
鹿門（岡千仞）乃偏出別解，訪我消受唯豔福，
一月之中易兩姬，要使餐花比饌玉。
兩行紅粉盡嫣然，如余好色流媚目。

⁵⁵ 同前引書，頁 226。

三女成粲我所歡，惜若蟠桃猶未熟。
三千年作蓬萊游，得遇仙姝緣不薄，
葯姬去後玉姬來，伴我一月山中宿。
靈丹九轉已入喉，石髓初凝還果腹；
人生此即萬戶侯，何須再要千鍾粟。
世間富貴只尋常，天上神仙有嗜欲，
一瞥功名安足問，百種溫存莫自促。
千秋萬歲等銷磨，古人已作一丘貉，
休從身後博浮名，且向筵前聽短曲。^{⑤6}

其實王氏更與小鐵、小勝兩位少女親暱，兩人與王氏均有枕席之緣。總計算來，王韜雖已年屆五十，而旅日數月，其共宿女子有名可稽者竟有六位之多。然王氏回國道經神戶，又與阿朵重聚，至長崎回國登舟之前，又宿妓館，前後相親女友不少於七人。此行可謂享盡豔福，若小鐵、小勝兩女亦均不過十六、七歲。亦服王氏才情，當可見王韜風流才子本色。王韜游記自述，並坦言其率性而作，風流自賞：

日東人士疑予知命之年尙復好色，齒高而興不衰，豈中土名士從無不跌宕風流者乎？余笑謂之曰「信陵君醇酒婦人，夫豈初心？鄙人之爲人，狂而不失于正，樂而不傷于淫。具《國風》好色之心，而有《離騷》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視資財如土苴，以朋友爲性命。生平無忤于人，無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⑤7}

近世旅日留日學人名士，文武將吏，其風流韻史，傳播遐邇，實至罄竹難書。若論詩才文采，恐多不及王韜。比較著作，亦未必有所超越。故願提示一二，供後之學者研討取資。

⑤6 同前引書，頁 252。

⑤7 同前引書，頁 246。又，王韜之旅日訪友，前人已多注意研究，最早者有：一、實藤惠秀，〈王韜的渡日和日本文人〉，《日本研究》，卷三期六，(1944)；二、陳復興，〈王韜和扶桑游記〉，《社會科學戰線》，1981 年第二期；張炳清，〈王韜扶桑游記史料價值發微〉，《綏化師專學報》，1985 年第一期。

五、前度劉郎，重現滬濱

王韜於光緒十年初結束香港之長期居留，重返上海定居，原在香港易名王韜字子潛，並署其居為天南遯窟，自號為天南遯叟。其避世隱晦之志甚明，乃一居二十三年，於其一生成就適多集中此一時期。惟王氏年事漸高，終覺在外寂寞，遂至光緒十年重回上海，仍住城北，但非昔日故居。並又改號其居為滬北淞隱廬，自署名淞北逸民。可代表其晚年階段。

王韜晚年返上海定居，恃何術以治生業，實賴其固有文名，特以當日出版界與報界有所借重。其中以點石齋與申報館為其在滬謀食之所，關鍵人物要為英人美查(Ernest Major)。美查自號尊聞閣主人，王氏於返滬前後均述及將著作交給點石齋出版之事。其一在於光緒元年(1875)：

歲在乙亥(光緒元年)，滬上尊聞閣主人索余著述，將付手民。余即以《甕牖餘談》、《遯窟譚言》兩種遞諸郵筒刊布。未幾而翻版者四出。一日余於書肆偶見閒談消夏錄，一繙閱間，則全勦襲余之《遯窟譚言》，一字不易。此外則歸安朱梅叔之埋憂集也，編撮成書，藉以弋利。坊中人辨其版，知為江西書賈所偽託。噫！此覆醬瓿物耳，而世乃有嗜痂之癖如此，誠有所未解矣。⁵⁸

其二在光緒十年(1884)：

余向有《遯窟譚言》，則以窮而遯于天南而作也。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小築三椽，聊度圖籍，燕巢鷓寄，藉蔽風雨，窮而將死，豈復有心于游戲之言哉！尊聞閣主人屢請示所作，將以付之剞劂氏。于是酒闌茗罷，爐畔燈昏，輒復伸紙命筆，追憶三十年來所見所聞，可驚可愕之事，聊記十一。或觸前塵，或發舊恨，則墨瀋淋漓，時與淚痕狼藉相間。每脫稿即令小胥繕寫別紙，尊聞閣主見之，輒拍案叫絕，延善於丹青者，即書中意繪成圖幅，出以問世。將陸續成書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隱漫錄》。嗚呼！余自此去天南之遯窟，住淞北之寄廬，將或訪

⁵⁸ 王韜，〈重刻遯窟譚言書後〉，載《遯窟譚言》（光緒元年成書，點石齋石印本。光緒六年九月重刻本。）

岡西之故園，而尋牆東之舊隱，伏而不出，肆志林泉，請以斯書之命名爲息壤矣。世之見余此書者，即作信陵君醇酒婦人觀可也。光緒十年歲次甲申五月中澣。^⑤

大致而言，王韜決計返滬定居，已非如昔日之傭書於西洋教士。此際王氏文名遠播，周游東西，見識日廣，上海出版家正要此類寫作之人加強出書，而《申報》亦並需要王氏之論著，此來上海，正自不愁衣食之資。適其時上海格致書院董事徐壽去世，次年即延聘王韜爲格致書院山長。^⑥

我人於此略知王韜在滬生活，以其格致書院山長爲本業，一直任至光緒二十三年王氏謝世。雖是晚年改入於學問教壇，實早於旅港期間之繙譯經典，及辦《循環日報》之經世維新變法文章，均具其廣泛領域之學者背景，在上海已是眾望所歸，在其個人亦是勝任愉快。

王韜本性，才華縱橫，風流跌宕，雖坐擁皋比，堂上夫子之尊，實在上海環境，終亦未改昔年悱惻芬芳之態。其年已屆花甲，而仍周旋妙齡女姬之間，在其回滬不久，即有《淞隱漫錄》十二卷之作，男女交游故事達百二十篇。又有《淞濱瑣話》十二卷之作，亦具故事百篇。此亦視作《淞隱續錄》，共爲二十四卷。全部記述婦女閨房瑣事，與往日《花國劇談》及《海陬冶游錄》具同類婦女故事之文集。足以代表王氏留心女性至細至深。真是王韜另一種特長。

王韜同治期間俱在香港，曾有《遯窟譚言》十二卷問世。乃仿《聊齋誌異》，文俱虛構。尙不能視爲同類。王氏亦自有言說明：

同治紀元之歲，余以避兵至粵，寄居香海，卜居山麓。小樓一楹，僅堪容膝。榜曰天南遯窟，蓋紀實也。夙寡交游，閉門日多。風晨雨夕，一編自怡，時有以文字請者，詼諧詭誕，不名一體。於是竊效干寶之搜神，戲學髯蘇之說鬼。燈晝更闌，濡豪暝寫，久之遂如束筍。因并篋中所存髫年之作，釐爲十二卷。名曰《遯窟譚言》。^⑦

因是王韜再次回滬之後，《遯窟譚言》已不足代表晚年最後一段香豔文作。況其內中多屬編造杜撰，亦不具史家資材之採取。

^⑤ 王韜，《淞隱漫錄》序（光緒十年五月石印繪像本）。

^⑥ 王爾敏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初版），頁53。

^⑦ 王韜撰，《遯窟譚言》序。

王韜晚年雖年屆花甲，仍不免馳情酒色，留連花叢。筆鋒所觸，不忘爲仕女記注。雖其著作已多虛構故事，然仍能見到真實可信之紀錄。若《淞隱漫錄》所載「申江十美」及「二十四花史」，皆爲當時滬上名妓，爲當日實錄。又有「橋北名花譜」，乃追記光緒五年旅日時所接見之日本藝伎。雖名號多與《扶桑游記》大致相符，要亦爲真實人事。凡此俱不應視爲杜撰之小說諧談。總計所涉名姝藝伎不下五十餘位。^② 足見王氏記憶之強，載筆之勤，以及用心之廣。

申江十美者，則一、陸月舫，二、王蓮舫，三、王佩蘭，四、王雪香，五、呂翠蘭，六、胡月娥，七、吳新卿，八、張善貞，九、顧蘭蓀，十、馬雙珠是也。王韜文中以玉鮎生之名代表其本人，並有夫子自敍詩酒風流，穿梭其間。尤其增添張書玉、吳慧珍兩校書，合稱之爲十二花神，皆並時名士酒席間所公定。^③

二十四花史者，則就同治元年至光緒十二年(1862 ~ 1886)之二十餘年間上海教坊名姬之最出色者。前十二姬，出咸同年間，即小桂珠、王桂卿、李巧仙、金二寶、張秀寶、王雲卿、褚金福、嚴月琴、李巧玲、邊金寶、胡桂芳、小阿招。王韜於此前十二姬，有自敍感嘆之言：

天南遯叟曰，當庚申辛酉間，江浙淪陷，凡士女之自遠近至者，群萃於滬濱一隅，重開香國，再闢花叢。其在城中者，亦復舍彼而趨此，由南而徙北。彈指樓臺，幾同蜃蛤，塞空世界，盡是琉璃。嗟紅粉之情迷，覺金銀之氣溢，吁其盛矣。余於其時，雖亦談北里之風月，訪南部之煙花，逐隊隨行，尋芳買笑。然而閒情徒寄，綺憾難平，方且欲絕溫嶠之裾，著祖逖之鞭，擊渡江之楫，揮回日之戈，投筆從戎，上馬殺賊。所志未遂，彌懷鬱伊，此所以散彌天之花雨，如坐摩登；聆遍地之笙歌，如參梵唄。猶浮雲之過太虛，無痕可跡；若止水之印明月，澈底皆澄。文字之障，概從屏棄已。在昔蛾眉謠詠，同是傷心，而今馬齒衰殘，不堪回首。^④

^② 王韜著，《淞隱漫錄》，卷八，頁5-6，11；卷十，頁11-14。

^③ 同前引書，卷八，頁5-6。

^④ 同前引書，卷十，頁12。

後十二姬，出光緒年間，即李湘蘭、朱逸卿、陳筱寶、姚婉卿、周素娥、孫靄青、胡寶玉、朱秀卿、吳新卿、金如意、陳菊卿、李琴書。此十二人中，有九人與王韜在昔交往，王韜亦不免有人事滄桑之嘆云：

天南遯叟曰，此卷中諸名姬，自周素娥、孫靄青、陳菊卿外，余皆與之往還。按拍徵歌，飛觴侑酒，謬許審音之涓子，錯呼顧曲之周郎。有時追憶影塵，深悲風絮，與之評紅品綠，懷古慨今，如談開元天寶遺事，令人歛歔欲絕。⁶⁵

王韜介紹十七名日本藝伎，其十七名花一一評品記注，更較詳盡。可與《扶桑游記》對比參考。要俱為王氏親見者無疑。茲檢其名如次：阿洛、小竹、才藏、小絲、駒吉、阿郁、小芳、阿艷、稚美（千代）、阿圓、小蝶、小鶴、小松、阿珊、小萬、苧蕪、福松。各具其品味特色，惟其小傳則不甚詳細。實亦難能可貴。⁶⁶

王韜所著《淞濱瑣話》十二卷，成於光緒十三年（1887），原視為《淞隱漫錄》之續，實亦自具首尾，並有序言。內容仍以杜撰故事為宗，但亦有紀實之篇。其中可資參考者有「談豔」分上中下三篇，完全為上海歡場名妓，列傳品評及其交往，均極詳盡，盡列光緒十四年當紅名妓十六人。王氏敘事，實多慨嘆：

余自道光季末，以迄于今，身歷花叢凡四十年，其間豈無盛衰之感？而以今證昔，覺歡場之非故，花樣之重新，殊令人望古遙集，慨想低徊而不能置焉。顧曲無人，紅牙絕響。知音誰是？藍本已亡。嗟乎！此曲已成《廣陵散》矣。⁶⁷

同書又載「記滬上在籍脫籍諸校書」一篇，網羅名姝數十人之多，亦為真人真事記注。⁶⁸

同書亦載「東瀛豔譜」上下二篇，俱為日本藝伎列傳，群妓名字有異有同，但無須再為一一列舉，惟可信其非出妄造。⁶⁹

⁶⁵ 同前引書，卷十，頁14。

⁶⁶ 同前引書，卷八，頁11-12。

⁶⁷ 王韜著，《淞濱瑣話》（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5月印），卷七，頁181-198。

⁶⁸ 同前引書，頁209-217。

⁶⁹ 同前引書，頁272-282。

同書更在勾欄群妓之外，紀錄詞場女說書先生，題為「滬上詞場竹枝詞」，蓋亦真實女子之列傳也。極具參考價值。^⑩

其他得之傳聞者，則有「燕台評春錄」上下二篇，「珠江花舫記」，恐非王氏所親身來往，要亦必多真事真人為憑，自是不甚重要，不作依據。^⑪

王韜晚年在滬寄居，上海已是繁華世界。長女苕仙早於同治間遣嫁錢徵（字昕伯），錢徵亦上海名秀才，為申報總編纂，亦是同類風流人物。王氏幸與老妻共居，林氏無才有德，一切逆境俱從王氏相依為命。但王韜雖老仍時出入花國，仍受群芳崇敬，固在祈望王氏為文標榜，足致豔名遠播；另一原因則盼借王氏引荐權貴，招納名流。王韜文牘自不易得，所刊尺牘二種，多不收錄男女隱密媒妁之件。所幸近今見到王氏致書盛宣懷函件。俱為晚年旅滬之作，足以捉捕一些片段。

盛宣懷同光之際多在北省，原與王韜無一接觸機會。當早聞其名。適在光緒十年(1884)，王韜日本友人岡千仞來華游歷，而到天津見及盛宣懷。在二人筆談中，岡氏言及王韜，表示十分推崇，乃予盛氏深刻印象。^⑫

王韜自港返滬定居，實是在港難免孤寂，並乏於用度。返回上海，已年近六旬，凡《申報》、《點石齋畫報》，主要在發售王韜之書。《淞隱漫錄》附於《點石齋畫報》發售。仍恃著書謀生。日本學者已稱其煮字療饑，而回到上海，只不過足以提高收入。惟決不至如其早期在滬之揮霍無度，質典度日。前此言其受聘為上海格致書院山長，其實並無脩金。此中對於王韜最為護持而時與接濟者則為盛宣懷。盛宣懷為上海格致書院舉辦四季考課，自光緒十三年起，每月供王氏銀二十兩。乃是盛氏私人承擔。盛氏另自招商局公款之中按月致送王韜乾脩二十兩。固定收入，已不謂少。^⑬ 不過王韜好色成性，仍是盡

⑩ 同前引書，頁372-376。

⑪ 同前引書，頁315-332，372-376。

⑫ 王爾敏、吳倫霓霞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初版），頁501-513，「盛宣懷與岡千仞筆談」。

⑬ 王爾敏、陳善偉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7年印，全九冊），第八冊，頁3394-3395。王韜致楊廷皋函云：昨由文報局奉到杏翁來翰，殊深欣慰，格致書院課題已出，大可掄取真才，札中云及已託閣下於杏翁公費內每月撥洋廿元送至弟處，略助翰墨之資，讀之感泐萬分。銘肌載切，如此與招商局一例，皆是按月致送，弟亦可酌每月日用所需，敬以奉告，併念盛惠於勿諼也。

情揮霍，寅吃卯糧，變本加厲，竟為幾位名妓向盛宣懷腆顏借錢。真是太過，茲舉其致盛氏函云：

弟看花之興，老尚未衰，綺席所呼侑觴者，蓉初月舫而外，別有張素雲詞史，即所稱中西合璧者也。五六兩月常折紅箋以招之，若至中秋，頗有窘態，三人所費需二百金，弟篋中私蓄只有百金，不得不出此下策，一至山左即行奉繳，甯食水而瘦，決不食言而肥也。^⑭

由此想見王韜之老而風流，用度無節，永遠愁窮患貧，豈望有富裕之日？王韜信中何以言山左之事，此係山東巡撫張曜（字朗齋）器重人才，仰慕王韜，專函四度，邀聘入幕，王韜受命即赴山東，並先到煙台與盛宣懷會晤，獲得盛氏餽贈不菲。繼到濟南，張曜派人迎於二十里外，並乘輿代步，近居撫署，便於咨商。此乃王氏畢生惟一一次進身官衙，佐理庶政，可惜王氏不耐繁劇，厭苦文牘，張曜雖待以優崇，仍不能使之安心，終以告退回滬。^⑮

王韜晚年風流如故，飲酒交游，不忘美女陪侍。此一時期最受盛宣懷之資助護持，感報知遇，於所見諸校書中，每為盛氏推介拉攏，游說情商，留有大量書信記錄，頗可概覽全貌，於此略舉一二，以見盛王二人交非尋常，眾香國中，王氏實受盛氏重託，擁彗先驅。見其致盛宣懷書：

前者所云，即陳湘蘭陳湘雲兩姐妹花也。湘雲即由小陸昭容改名者，以奉雅命，立經物色之，所聞不如所見，為之廢然而返。近日後起之秀，無如林桂芬，惜其齡太稚耳。前時閣下欲覓張桂卿，今屢見其人，儼屋南公易里，臉帶桃花，色頗可人意。或有謂其已生一女者，不得而知也。或又謂容貌在清和坊張桂卿之下，則恐未必然也。他如顧采苓之蕩，林黛玉之濫，陸小寶之浪，容色雖佳，風斯下矣。其有張豔幟噪芳譽者，則吳佩香亦屈一指，趙文仙頗流麗圓轉，堪與之匹者為吳佩蘭，繼起中可與林桂芬頡頏者，則有李金玉。又若李湘舫雖未著名，亦稱矯矯。趙宜春近與白眉仙割席，不復作絳帳中人矣。然其人齒加長矣。急宜擇人而事，以出風塵。月舫獨立門戶後，始則門前車馬頗為寥落，冬季稍可，然終不逮從前。歲結尚虧負四五百金，合之贖身，所費身價幾

^⑭ 同前引書，第八冊，頁 3387-3388。

^⑮ 同前引書，頁 3385-3388，3405-3409。

至二千五百圓，殊自悔從前之不決意相從也。^{⑦⑥}

原來王韜曾為盛氏介紹陸月舫（信中號為廣寒仙子），俾盛宣懷收為姬妾，最後女方不願，未能成功，王韜此信乃述及陸女之悔意也。^{⑦⑦}王氏另為推介姚蓉初校書，先以照片給盛氏看，後亦未成。嗣又介紹寶琴、佩卿兩校書，據其書信可知：

三日中皆得與寶琴佩卿兩麗人相見，共桌而食，縱談無忌。因逆探兩麗人之心，皆有願為夫子妾之意。而寶琴之私衷尤切，惟梅子梢頭，兩人俱含醋意。論其齒，彼此俱當破瓜年紀。若閱歷世情，侍奉閨幃，舉止談吐，有心計，有見地，自以寶琴為優。佩卿則出自小家碧玉，去年八月初墮風塵，未染箇中惡習，天真尚屬未漓，并不知有勾欄中苦趣。飲食衣服容易將就，尚未知窮極華靡。故其眼界識力，亦遜寶琴一籌。鄙意以為，此兩人者皆可以金屋貯之。何不以一箭中雙雕耶？需者事之賊也，失今不圖，後悔莫及。且最難得者，兩人此時皆完璧。即不然，先為梳攏何如？^{⑦⑧}

王韜多次為盛宣懷物色妙齡少女，為報其長期照顧，自可視為當然。其實王氏但凡文人學士、名卿巨公，亦必用其特長，循其熟徑，於眾香國中亂點鴛鴦。如朝士文廷式，名將劉永福（提督）、方照軒（提督）等到滬，王氏亦必招集名伎侑觴助興。舉其一信可知：

滬上別無所聞，方照軒劉淵亭兩軍門來，弟為之把酒拂塵，一時群花畢至。方軍門屬意呂翠蘭，以王佩蘭雖有狀頭之目，然嫌其龔黑，不足當牡丹之稱。頗注意於蓉初，以弟所愛，不敢問鼎。其實弟欲完趙璧以待紫藤花館主（盛宣懷）耳。^{⑦⑨}

王氏前後多次向盛宣懷推介陸月舫（廣寒仙子）並媒介姚蓉初，此信具見王

^{⑦⑥} 同前引書，頁 3482-3484。

^{⑦⑦} 同前引書，頁 3360。又，同前引書，王韜致盛宣懷書：「廣寒仙子之事諧矣。敬將好消息報與杏花知，月舫有密友，是伊同鄉人也。昨弟致書廣寒仙子，令其招之來，示以弟書，與之酌商。弟書中有五好之說，為之思慮，面面周到。欲全得五好，無有如嫁杏者。今將其友來書上呈。彼欲請子萱大令作介紹者，蓋以鈔之一字耳。速則請子萱言，遲則俟弟病痊能出往彼一譚，均無不可，渠家與子萱大令亦極相稔也。」

^{⑦⑧} 同前引書，頁 3527。

^{⑦⑨} 同前引書，頁 3391-3392。

氏用心。惟將當紅名妓隨時多所品評，可見其深熟於青樓風月：

姚蓉初即王蓮舫之後身，著籍之後，仍復其門如市，兩年以來，頗有蓄積。此姝心計甚工，一錢不肯妄費，申園之游，必與陸雨生同坐馬車而來，非客出錢，則馬車必不坐也。其心知者兩人：一曰陸雨生，一曰朱少谷，皆非上品。顧蘭蓀雖嫁徐姓，然嘖有繁言也。吳新卿已開閣放楊枝矣。呂翠蘭雖甯人，而容貌差可人意。近已改名為謝湘娥矣。胡寶玉巋然為魯靈光，老醜已甚，而尚能得闊客肯畀之金錢，亦大奇事。他如林黛玉之淫蕩，陸小寶之風騷，徐善貞之幽怨，皆於勾欄中別開一境界。後起之秀雖有人，然約舉之，不過得二三人而已。他日再以奉告。^⑩

於此諸情，當可見王韜之老而風流，亦足以稱為花國情聖而無愧。其為群姬所重者，愈老不衰，蓋在於名流之結識，豔名之推廣。王氏多情風流，亦樂得穿梭其間。

王韜為報效盛宣懷，悉心引介姚蓉初、陸月舫，雖然好事難成，卻並不氣餒。又為盛氏訪到蘇州小女子程阿福，年方十五歲，花費五百元藏之金屋，不小心竟被其私自逃匿，落得人財兩空。王韜致書謝家福，述及其事，十分懊惱。時在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1896.1.22)。

滬上歡場，近又一變，芙蓉城主已隨瘦腰郎去，惟八咏樓中，帶圍漸減，恐無續命纓，奈何。廣寒仙子自立門戶，改陸為華，然門前冷落車馬稀矣。後起之秀，則推林桂芬，問其年，止盈盈十三齡也。杏翁來此，迄無所遇，現侍左右者，不過兩粗婢耳。弟曾為代覓一金閨小女子，名曰阿福（姓程，其兄曰炳南。住慈悲橋），年僅三五，頗有姿致。杏翁雖評之曰超等，而意仍未屬。此女子已墮藩溷，弟拯之黑海，藏之金屋，以其猶是葳蕤之質，未遽問津。不意竟敢開閣自去，空費阿堵物五百元。此真花月其貌，蛇蝎其性者哉。如此種人，當墮阿鼻地獄。^⑪

^⑩ 同前引書，頁3457。

^⑪ 〈王韜致謝綏之函〉，載《近代史資料》總66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印），頁22。

此時王韜已六十九歲，猶與髻齡稚女周旋，固不自慚其老醜。真是老而風流，得非天性使然？

惟王韜愈老彌堅，自創弢園書局，不斷著書刻書，並為售書張羅。在其致謝家福同一信中，申明用心所在，真可謂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人生須有高遠境界，並更須肯定自我之成就。無論功德功業、學術文章，當在天地間留存幾許影響價值。茲舉其晚年最後所論，以見其生命力之旺盛強固。

今年相識中多凋喪者，潘君鏡如，張君少渠，年僅長余一歲。敝戚醒逋（楊引傳）沒已逾一載，墓草宿矣，思之腹痛。人生忙迫一場便休，鐘鳴漏盡而猶夜行不息，真苦惱眾生也。弟為文字禪束縛，著述畢生，亦徒自苦耳。亦思數百年後，空名豈澤枯骨哉。幸弟子于一切詩詞古文，信筆立書，不假焦思苦慮。茲之刻書，非必欲傳世，亦使世間知有我之一人，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非然，將與石火電光、塵露泡影一齊消滅，非我佛涅槃本意也。^②

六、結 論

王韜粗胖黝黑，其貌不揚。十八歲以首選入學，顯露文名，而實才華超卓，越軼恆流。筆下辭藻豐瞻，文采動人。自具名士條件，亦抱自信。王氏自我期許有謂「吳門王胖，其才無雙，豪具北相，聖壓西方」。至其詩文高超，才思敏銳，亦抒自信之言「牛馬精神，猿獼品概，日試千言，依狗可待」，所謂夫子自概，亦見非凡。

王韜止一落拓小儒，秀才生員而已，天下何止千千萬萬，豈有自見之機。當將沈淪下位，與草木同朽。而後世論王韜著作不下一百七十餘種。其生前何以得大名，死後何以受重視。值得學界深入思考。本文偏於其風流性行之探討，不欲扯離本題，亦在節省筆墨，蓋不必要擴太至全面申解，顧彼失此。自當先作聲明。

王韜生平著作，本文中所資取者，因多風月遊戲詩文，而其作品特色，表現關注當世真人行徑，多為其同時代實錄，頗具史料價值，留待識者資取。當

^② 同前引書。

今學者，尚少涉談此類資料，乃願作一嚐試，拋磚引玉。再強調言，此類風花雪月故事，有其時代性，尤其真實人物事跡，為治史者所應留心研考。在當時是遊戲，在今日是學問。

進一步思考，王韜正是代表十九世紀香豔書籍出版推廣與著作之巨擘，雖非獨佔，實為大宗。更且以王韜個人影響，推進日本文化界。可於王氏自敘中見之。

去夏余養痾日本之東京，小住十旬日，與其國之文人勝流，筆談往復。余所刻數種，彼國人皆購而藏之。而深以流傳未廣為憾。群向余乞之，獨《遜窟譚言》一書不脛而走，早已無存。或勸余重為排印，然非余志也。尚憶余初至東京時，攜《豔史叢鈔》百部，寄售坊中，頃刻立盡。佐田白茅慨然謂余曰「洵哉正史遠不逮豔史矣，於此不可以觀世變哉」。^⑧

在此可以說明，王韜除自撰新作之外，更搜輯前代之所謂淫書而匯為一種《豔史叢鈔》。在此領域之內，王氏當可說抱持一定宗旨而為之。有一旁證可見，當盛宣懷乘輪船前赴煙台，王韜特贈送盛氏一套《肉蒲團》六冊淫書，並介紹在日本備受歡迎，而改名為《覺後禪》。真是有心人風月無邊。^⑨

王韜不但推廣《豔史叢鈔》，在其早年咸豐初年已搜集男女交媾助興藥方，題稱《璇閨秘戲考》。俱是一帖帖助陽媚內，男歡女愛之外用藥劑品名秘方，並具劑量用法說明。此外另有一二種治花柳病方。現有其手抄本附於其《蘅華館雜錄》，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志嚴肅研究者，應作一深入研考。^⑩

或問王韜旅港二十三年之久，較少酒色徵逐，當作何解？此誠為可疑之點。一在記載之缺乏，一在環境之改變。難作的論。惟王氏偶記，於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1866.8.27)有揚州來粵女妓，名李翠姑，王氏憐其飄零，與之定

^⑧ 王韜著，《重刻遜窟譚言》書後。

^⑨ 《肉蒲團》一書，今世學者頗多留心研考。名家中有錢鍾書、孫述宇、劉紹銘等人。鄙人在七〇年代曾閱讀，以為遠遜於《金瓶梅》，很接受孫述宇見解。劉紹銘，〈《肉蒲團》的喜劇世界〉一文，見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三十日《聯合報》二十九版「聯合副刊」。

^⑩ 王韜手抄，《璇閨秘戲考》，收入《蘅華館雜錄》手稿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情，並賦詩二首。有謂：「姊妹飄零夫婿死，天風吹下粵江頭」。留存紀事。顯見王氏用情如昔。^⑩再閱及王氏所寫〈珠江花舫記〉，原來王氏亦偶訪廣州，對於江上艇妓自不陌生。其時在流浪生涯，既無處借貸，又乏同道知好，偶游廣州，若非腰纏十萬貫，如何敢越雷池一步。

王韜風流豔史，罄竹難書。其情書談豔，閨閣詩，悼亡詩，遊戲風月詩，品評名姬詩，多難舉其百一，本文無法容納。相信海內學者必有嗜痂者願一檢視，若加研考，亦足可完成巨構，補充文史。本文引一端緒，使王韜研究另闢一廣闊天地。但存史乘之真，不畏人言之責。人生百態，世事萬殊，豈可執著一端，輕忽他隅。天既生斯人，即須真能見及斯人全貌。本人雖非道學先生，但亦不能將淫穢篇章語詞引入論據。王氏著作中甚多淫詞，尚有待後聖予以表暴。

王韜究為何如人？其生命表現多采多姿，俱值考索。未可遽然而概括其生平，本文僅開一端，亦不須負責有所評定。惟暫時畫地自限，但就其詩彩藻豔，書史著述言，自不遠於傳統文士風概，且必具名士質姿，乃可斷言。但就其周旋名姬之間，出入群芳之苑，亦多同於歷代風流文士，實無代無之。王氏即使不能高攀前人雁行，亦必當視為同類。然而其不同遭遇之點，繫乎其流寓通商口岸之環境，傭書西士之職業。更有機會漫游域外，觀光東西名都。凡此俱是前修所無，而王氏獨具。使其立足位置，兼顧中外新知識與西方文化特色。終亦使之成為轉變時代一個文士典型，後世學者屢屢不厭研析探索，正以其著作可憑，閱歷可觀。而千秋定評，尚不易得。

王韜雖是詩酒風流，狂放不羈，而終為知書之士。英士理雅各、湛約翰，法國漢學家儒蓮，無不以儒學宗師待之。皆有實事可據。王韜亦非浪得虛名，其經學造詣，自亦具深厚水準。惟佔其生平所涉者較不為人知，自更無人重視。今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有少數學者注意王氏之古曆學。此乃吾之中學授業師曾次亮先生點校重編其《春秋歷學三種》，書名係曾先生所定；其中包括王韜所著《春秋朔閏日至考》、《春秋朔閏表》、《春秋日食辨正》三

^⑩ 《王韜日記》〈悔餘隨筆〉，方行、湯志鈞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印），頁217，「有校書自揚州來者，姓李字翠姑。陳君柳屏繩其美，遂往一見，與之定情，時七月十八日也。」

者。業師曾次亮先生係河南省天文曆算學家，對王氏貢獻有正面肯定。如其所云：

王韜對於春秋歷的研究及其著作，基本上改正了杜預以下各家春秋長歷的重大錯誤，排定了近於當時歷法真相的長歷，不但有一定的學術水平，並且在中國古歷研究上也可以說是劃時代的著作。因此，獲得了相當的國際聲譽。^{⑥7}

尤其肯定王韜所謂「晉用夏正」，以及「周不頒朔，列國之歷各異」等創意見解。此外在實用上，又有當代春秋左氏學大家楊伯峻先生，在其所著《春秋左傳注》中，對於王韜歷學廣加利用，並亦肯定王氏貢獻。凡此俱亦可證明王氏經學地位不可抹殺。

附記：關於王韜資料，大陸湖南岳麓書社鍾叔河先生。遼寧社會科學院李景光先生提供大批資料，特此申謝。本文撰著期間，承呂實強、陸寶千、王樹槐等先生多所指正，特申感謝。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
寫於揮泥揮雨軒

^{⑥7} 王韜著，《春秋歷學三種》，曾次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1月印）。